
基于抗战防空疏散的近代重庆城市发展

谢璇¹ 骆建云²

(1.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2. 广州市民用建筑科研设计院, 广东广州, 510055)

【摘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出于安全需要, 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主的后方城市开始了向乡村疏散的“自救”过程。在疏散的同时, 乡村也迎来特殊的建设机遇。几年下来, 疏散促使重庆城区范围不断扩大, 乡村开始了城市化的发展。疏散过程中形成的新的聚集点, 成为战后规划卫星市镇的首选, 奠定了今天重庆主城区的城市格局。

【关键词】抗日战争; 疏散; 城区拓展; 乡村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1 战时疏散是乡村建设的特殊机遇

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随着国民政府选择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作为抗战大后方基地后, 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由东向西的迁徙运动。国家中枢、工业厂矿、学校等纷纷向西部的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相对安全的城市集聚。由于敌我作战实力的悬殊, 大后方这些城市又没有完善的御敌防空体系, 因而在敌人开始施行空袭轰炸时, 这些城市往往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尤其是战时首都重庆。和城市相比, 地域范围广大的乡村是相对安全的。为坚持长期抗战保存实力, 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 国民政府施行了操作性较强的战时消极防空策略, 将集中在各城市中的人口向其附近乡村疏散。

20世纪初, 西方的城市如伦敦、纽约等, 在工业革命后, 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聚, 城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变得拥挤不堪, 市民的生活环境日益恶化, 甚至出现贫民窟等现象。针对因工业发展而带来的居住、卫生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西方国家的城市规划师和社会学家遵照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宗旨, 尝试通过诸多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 如柯布西耶的集中机械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 也有试图以“分散”来缓解大城市问题, 包括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 赖特的广亩城市, 以及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等。其中, 以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较为实用, 尤其是“二战”后, 该理论对指导“卫星城”建设来疏散和重组特大城市的空间和结构, 起到重要的作用。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兴起之时, 正是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 这些西方城市“减负”理论, 随即影响并指导中国战时基于城市安全需要, 由城市向乡村的疏散行动。和西方国家因工业发展, 将城市过于膨胀的人口向乡村疏散不同, 战时中国的疏散政策, 起初完全是从战争安全角度出发。

在疏散的过程中, 人潮不断涌向相对落后、闭塞的乡村时, 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这将是一次发展乡村的特殊机遇。除了避免敌机轰炸保存人员和物资实力的目的外, 疏散与建设并进, 依靠疏散为主的外来动力, 在抗敌生产的同时, 促进了乡村的发展。“将附近的乡村建设起来, 朝着田园都市的路上去”^[1], 尽量缩短乡镇与市区的差距, 成为疏散过程中更有意义的任务。几

1**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937-1949年重庆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10YJCZH183)

年下来，基于政治军事防御和城市安全目的的战时城市“自救”行动，促使战时大后方的城市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2 疏散促进城区范围的拓展

战时首都重庆是遭受日机轰炸最为严重的城市，对于疏散地点的选择，国民政府通过在重庆近郊设立迁建区来安置内迁的国家中枢、政府机构、工厂和学校等。而普通市民的疏散地点则距离市区更远，疏散区域更为广泛。但无论疏散距离的远近，疏散地点都优先考虑水运和公路交通便利的地方。

随着疏散区的初步成形，城市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从重庆城区拓展的几个阶段看(图 1)，1940 年城区的扩大，完全是由战时疏散所致^②。在重庆近郊的主要疏散区域，过去较为发达的场镇，疏散沿途主要的交通集结点，战时工厂、学校、政府机构等因疏散形成的新聚集点，如西郊的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新桥、山洞、歌乐山、高滩岩等；嘉陵江北的观音桥、猫儿石、杨坝滩、香国寺、溉澜溪、寸滩等；长江南岸的海棠溪、黄桷垭、龙门浩、弹子石、大佛寺等都相继发展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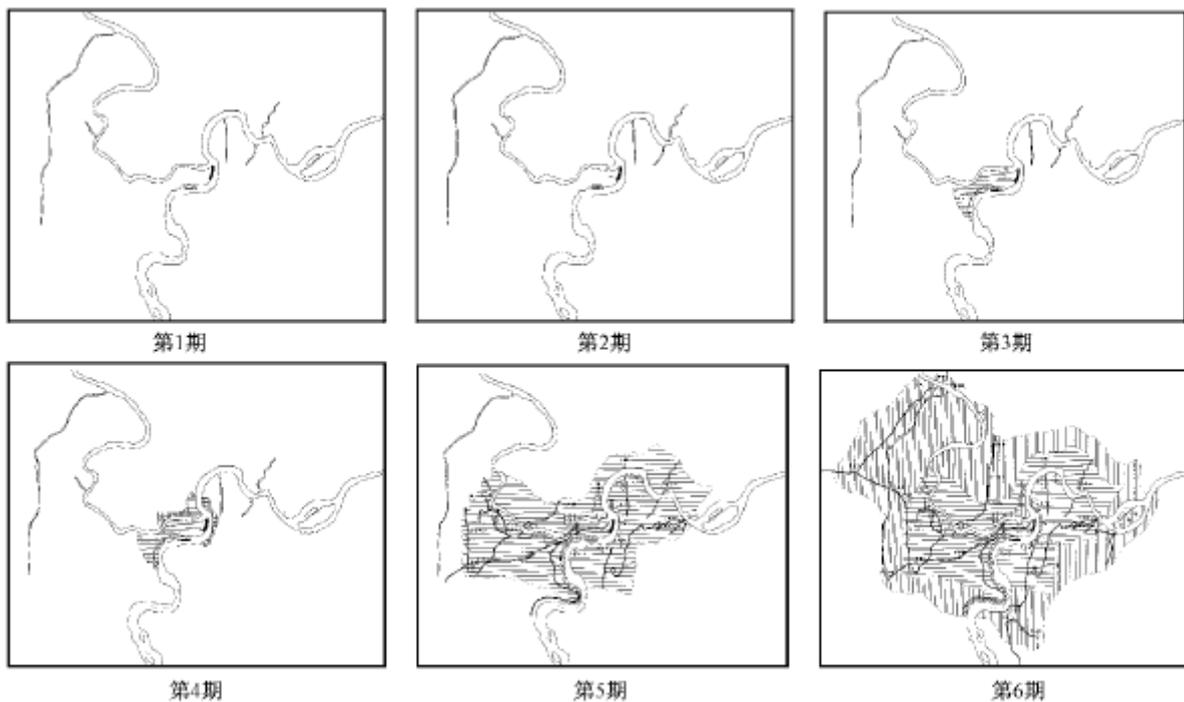


图 1 重庆城区拓展示意图(1940 年)

资料来源：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 1946 年编写《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第 2 图

战时重庆向近郊和远郊的散开，使得日机的轰炸效果，远没有达到其设想的目的。1940 年 8 月，日军远藤三郎被任命为第

^②①战后《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中将重庆城市的发展划分为 6 个阶段：1. 陪都核心，由两汉迄今，均在两江汇流处。2. 嗣后城内外开辟公路，人口重心向城中移动。3. 1928 年划定新市区范围，面积达 8km²。4. 1929 年，市政府正式成立，1933 年重划市区，合计水陆面积为 93.5km²。5. 1937 年国府西迁，1940 年市区扩大，面积约 300km²。6. 战时迁建区范围北达北碚，南至南温泉，东起广阳坝，西抵白市驿，此大陪都面积约 1940km²。

三飞行团团长，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曾连续多次地乘坐轰炸机空袭重庆，从重庆上空看到两江怀抱的重庆市中州被破坏得面目皆非，但被大江隔开的两岸地区，特别是右岸地区广阔的范围渐现发展趋势，真不知如何轰炸才能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2]。“判断重庆已成为一片废墟是个错误，据本人所见，重庆正在向周边地区发展，……重庆市的扩大是从抗战时期开始的”^[3]。

可以说，在整个疏散过程中，和普通市民的疏散不同，大批的迁川军工和民营厂矿、机关、学校等是有秩序向郊外乡村迁建的，在进行有限建设和生产的过程中，对当地产生较大的影响和作用。其中，因疏散形成的沿江分散式工业区和“沙磁文化区”成为战时推动乡村城市化发展的主力。

3 近郊分散式工业区和文化区的形成

3.1 近郊分散式工业区的形成

由于战时重庆的电力供应仅限在半岛旧市区，而且战时重庆的公路交通较落后，铁路运输尚未成形，交通方式以水运为主，因此以兵工厂为龙头的内迁工厂只能选择在重庆近郊长江和嘉陵江两江沿岸台地建厂。

在战争背景下，内迁来渝的大多数工厂一般经过一两年时间完成了厂区建设。但由于时间仓促，建设空间和场地又受到战争威胁，战时重庆的工业布点缺乏统一和科学的计划，是一种非正常状态下应急式的工业区发展模式。在重庆尚未自主形成工业区的条件下，以快速、粗糙、简易植入的建厂形式，开发了两江沿岸的农田、荒地和码头，形成了沿长江东起郭家沱，西到大渡口；沿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桥的既分散又相对集中的线型带状工业地带(图 2)。

由于数量众多的工厂，尤其是占地面积和规模较大的兵工厂，它们选址和布局一经确定就不会轻易更改，给当时的重庆城市布局 and 空间结构带来较大的变化。因此，在 1941 年制定的“陪都分区计划”以及战后 1946 年编制的《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中对工业区的发展规划，都是以战时形成的沿江分散式工业区为基础。



图 2 战时重庆近郊工业区(点)分布示意图

战前的各大兵工厂分散在全国各地，一般都建在各大城市的外围，或者是较为偏远地区，兵工厂建设只是局部改变了城市空间，对城市的格局和结构影响不大。极少有像抗战时期的重庆这样，在半岛中心的两江沿岸，聚集全国近 50% 的兵工厂。这种

由战时特定的环境造成的城市现象，随后影响了重庆城市长达近 70 年两江沿岸的城市景观^{②3}。

3.2 “沙磁文化区”的出现

沙坪坝位于重庆市的西郊，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随着成渝公路的通车，炼钢厂的建设，以及重庆大学、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等重庆最早的高等教育学府在此选址建校园，沙坪坝已从一片僻静的乡村开始了初步的城市化过程。1936 年 12 月，重庆大学胡庶华校长在《重大校刊》第四期发表的《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一文中首次提出：“为国家培养人才，在沙坪坝建立重庆新文化区”的设想，并在文中勾画出文化区最初的蓝图以及发展前景。

文章发表后，在当时的重庆产生了较大的反响。随即抗战爆发，但幸运的是，胡校长提出建设文化区的愿望并没有因战事而中断，而是在诸多内迁学校的推动下，在罗家伦、张伯苓等著名教育家和社会名流的共同努力下，将文教事业与战时救亡图存连为一体，促进了文化区的形成(图 3)。



图 3 沙磁文化区区位图

在文化区的物质建设上，战时“沙磁”文化区能够形成和发展，除了本身的区域优势和已有的教育基础外，还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表现在：战时的沙坪坝不仅汇集教育机构和高等学府，还有多种实业的支持；除古老的货物集散商业码头磁器口外，战前发展起来的丝厂、炼钢厂等现代化的产业，以及在磁器口开展的乡村建设，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区内工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此外，在战前已有的两所本地高等学府的基础上，战争初期天津南开中学和中央大学率先迁入，名校的示范效应，促使随后诸多学校汇聚在沙坪坝，成为战时文化区形成的中坚力量。而重庆大学和南渝中学的校园建筑，更成为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标志，沙坪坝已初具发展文化区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氛围。因此，在 1941 年制定的“陪都分区计划”和 1946 年的《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都明确重庆城市文化区“在小龙坎到磁器口一带，以沙坪坝为中心”。在 1942 年版《重庆指南》中列出的陪都新八景中，沙磁文化区以“沙坪学灯”成为陪都一景。其描绘为：“磁器口下，嘉陵江岸之沙坪坝，誉为陪都文化区……学府林立，幢幢校舍相望，晚课教室通明，是为学灯。”

4 疏散作用下乡村空间的变化

^{②3}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对环境的治理，抗战时期迁渝的兵工厂纷纷迁走，重庆两江沿岸工厂林立的城市景象才发生根本的改变。

经过战时短短几年时间，在重庆近郊乡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工厂的植入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促使乡村开始了城市化的过程。所谓“城市化”，其本义是指人类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摆脱乡村的束缚或对乡村的依赖，独立于乡村之外，并相互形成一个城市体系，产生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进入持续发展状态，最终取代乡村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和人类社会发展中心的这一过程^[4]。简单来说，城市化就是指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包括物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素质的提高。而城市化的动力是由城市的经济因素决定的。

在战时重庆工业区集中的郊区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多是来自以兵工厂为龙头的大型重工业厂矿建设。工厂的出现，促进周围物质环境的改变。由于建设工厂，尤其是兵工厂和钢铁厂，需要大片的生产和生活用地，规模较大，并且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在这些工厂区附近也相应建设了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

因此，以工厂为中心在其外围逐渐形成新的居民聚集区和街市，改变过去单一的乡村面貌。其中，有以军工厂为主的聚点，如大渡口和郭家沱等。也有纯民营工厂聚集点，如李家沱工业区。而数量最多是军工和民营工厂混合形成的聚集区，如江北的香国寺、猫儿石、观音桥、溉澜溪等地。从各工厂的分布区域看，在战时疏散的前提下，分散的工业区决定了新城区的拓展范围。其中，以钢铁工业而发展的大渡口工业新市镇以及军工与民营厂矿包围的江北观音桥中心区域的出现，是乡村空间变化最突出的城市现象(图4)。



图4 各工厂影响下的观音桥中心的出现

而战时教育不仅对城市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也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的城市化进程。在防空疏散中，西郊小龙坎一带因是三条进出沙坪坝的公路交通结点，从而聚集大量的人群。而抗战初期，天津南开中学的进驻，轰炸后外来的学校和机构等的不断涌入，促使沙坪坝的物质空间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以小龙坎为起点，顺着沙磁公路，在中段以南渝中学和重庆大学为中间节点，最后以磁器口为终点的以点带面的线型城市空间形态，尤其是在南渝中学和重庆大学之间已逐渐连成片。

“善投机的人，早知道从南渝到重大中间的一段路是块风水地，于是拼命的建房，开铺子。……以吃食店最多，书店其次。除此之外，还新添了专卖日常用品的商店，以及流动的铺子，……沙坪坝变得摩登多了。”^[5]内迁学校进入乡村，在带来先进的文化知识和人才外，也逐渐以文化教育来促进该区域的乡村城市化，这就是沙坪坝文化区形成的外来动力，这也是战时重庆继兵工厂集聚在城市两江沿岸创造工业景象外，因文化教育的推动而出现的又一个城市奇迹。

5 以战时疏散为基础的陪都卫星市镇规划

抗战胜利后，针对重庆城市中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国民政府在还都南京之前，组织编制了《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在

《计划草案》中基于疏散半岛市区人口，降低市区人口密度而拟定了发展卫星市镇的计划，即“本市半岛为母市中心，……最多能容纳 40 万人。其余应向各卫星市作有计划分布”^[6]。而《计划草案》中对于卫星市镇的布点完全是基于战时疏散形成的“大重庆”的城市格局，以及尊重山城特定的地理环境，做出的城市发展设想。

众所周知，古代重庆城市受地理环境所限，以及城池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很长时期都以半岛为主，城市的有限拓展是选择江对岸的江北，形成双城格局。近代开埠后，随着日租界的设立，使得长江南岸也有了局部的发展，于是形成三足鼎立的城市空间雏形。但无论是江北还是南岸，都只是局限在“点”上，整个城市发展呈现出相对稳定、缓慢发展的趋势。而在抗日战争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下，城区范围成倍扩大，基于不同功能、多个疏散集中点的出现，使得重庆城市空间格局在八年抗战期间发生了较大的突变。而战后《计划草案》对于卫星市镇的划定，反映了重庆在抗战中从集中到分散，分散到集中的城市发展过程，而这些功能不同的疏散集中点，已初步具备卫星市镇发展的基本条件。

计划中的卫星市镇中，受限于地理环境，有 9 个卫星市、9 个卫星镇是沿长江和嘉陵江呈线性、跳跃式分布。和其他城市一样，选择临江是与河流有直接关系，河流是水源、工厂生产的动力源以及交通通道。但和其他城市不同的是，陪都在河流两岸成线型“点”状分布了 18 个卫星市镇，数量已超出一个城市正常状态下的发展速度和广度，这反映了随内迁而来外来动力的强大，并且从这些卫星市镇的性质看，以推动战时陪都经济发展动力的工业居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距离母城较远西郊的“沙磁文化区”，南岸南坪场附近，以及江北和杨家坪一带等计划中的卫星市镇，已有促使这些区域形成新的城市中心的趋势。在城市从江岸逐步向内腹地纵深推进的发展过程中，已初步具有多中心组团结构式的城市雏形(图 5)，这在后来的城市发展中得到证实。而以工业性质居多的卫星市镇，决定当时重庆是以工业为主的生产性城市。



图 5 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结构示意图

6 结论

在面对战争带来城市安全危难时，国民政府通过强制疏散的办法，促进了重庆城市地域空间范围的拓展，并给广大的乡村带来建设发展的机遇。其中，内迁而来的工厂，由于防空要求，在重庆近郊两江沿岸形成多个分散式的工业区，进行战时国防和生活物资生产。并以此为契机，以各个厂区的建设，促进了两江沿岸重庆近郊乡村的城市化发展，出现多个以工厂为中心的新市镇，如大渡口钢铁工业区的形成，以及因工业区的发展而引起的江北区中心的转移等城市变化。

同样，“沙磁文化区”的形成，也推动了乡村的城市化发展。几年下来，疏散拓展城市空间，改变了城市的格局，初步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梅花点状”的大重庆城市布局雏形。而因战时疏散形成的新的聚集点成为战后《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

中卫星市镇的基础，建构了今天重庆主城区的城市骨架。

参考文献

[1] 吴济生. 重庆见闻录 [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0:162. [2] [日] 前田哲男. 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
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 [M]. 王希亮, 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7:256.

[3][日]前田哲男著. 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M]. 王希亮, 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7:269.

[4] 王瑞成. 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 [J]. 史学理论研究.

[5] 邵漪. 新重庆的文化区 [J]. 见闻, 1938 年第 1 卷第 5 期.

[6] 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 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 [M]. 1